

本书是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发展战略》成果之一(课题项目批准号:05JZD0038)

城市文化资本论

第二版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内 容 提 要

本书首创“城市文化资本”的概念,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研究“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和城市“文化生产场域”理论的专门著作,在研究“城市文化资本”的意义上,具有填补空白之功。

本书特点如下:(一)针对世界范围内城市化发展现实与问题,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的再建构理论与模式,为21世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寻找了一条新的路径与方式。(二)分析了中外“城市文化资本”与城市形象美学理论的发生与发展过程,论证了“城市文化资本”与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力建构的关系。(三)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隐喻”的文化属性,其目的是“让文化资本成为大众手里的武器”。(四)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的文化符号象征与价值,并创造了相关参照体系。(五)提出了“伟大城市文化”的“质”性意义的建构。(六)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相关的“概念的类”的文化属性。(七)提出了“后都市主义”的认知体系。(八)提出了“为人民重新设计城市”的理念与价值观。(九)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运作与城市品牌及形象营销的文化模式。(十)提出了“为人居立大典”的“三立观”。(十一)提出了“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概念,强调再造人类“集体记忆”,创造21世纪“中学西渐”的规模化趋势。(十二)提出了从“社会炼金术”到“文化炼金术”的现代文化资本运作创新体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书充分体现了理论研究的深度和资料运用的广度,具有全新的、完整的、系统的可操作性。并且还具有全新的理论视角、全新的创新观念、全新的操作方式、全新的文化视野、全新的认知价值。“让生命赞美城市”及“让城市赞美生命”,给人以终极价值的解释,在探讨“城市文化资本”意义的同时,又能够让让人理解或者重新审视人生的文化价值与资本意义。全书自成体系,思维方式独特,具有鲜明的学理性、学术性、操作性和科学性,充满思辨性思维、哲理性价值取向和创新性的非常规性思考。

本书适用范围:城市学理论研究、城市与城镇管理与研究、城市决策与研究、城市规划设计、城市建筑设计、城市景观设计、城市生态设计、城市空间艺术设计、城市战略规划、城市商业规划、城市会展策划、城市形象策划、城市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城市文化研究、城市文化产业研究、城市创意产业研究、城市广告设计、城市传媒运作与设计、咨询策划公司、广告公司等相关从业者及大中专院校的师生研究、学习和创作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文化资本论/张鸿雁著. —第二版.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641-1893-8

I. 城… II. 张… III. ①城市社会学—研究 ②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 IV. C912. 81 F2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9894 号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版人: 江 汉

网 址: <http://press.seu.edu.cn>

电子邮件: press@seu.edu.cn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42.25 字数: 750千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41-1893-8

定价: 99.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传真): 025-83792328

作者简介



张鸿雁,1954年生,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先后担任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院副院长等职。现任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主任和首席专家。《中国名城》杂志主编。

1985年负笈游学江南,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先秦城市史,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长期以来主要从事城市经济学、城市规划定位与概念设计、城市社会学、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战略、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城市产业空间结构与创新、企业策划与企业战略运作及企业营销实务等方面的研究。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城市社会学、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战略、城市经济与房地产、当代社区理论、城市文化资本论、城市经济史、先秦史、中西城市文化比较、城市发展定位与城市概念设计、企业策划与企业发展实务、企业文化创新与企业形象(CIS)设计、城市与企业危机控制与管理、企业赢利模式与区域市场营销管理等。

在《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管理科学》、《城市问题》、《民族研究》、《哲学与文化》(台湾)、《社会科学》、《江海学刊》、《中国软科学》和《光明日报》等几十家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160余篇。出版各种学术专著17部,主要有《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1988)、《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2000)、《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2006)、《城市定位论》(2008)、《城市文化资本论》等。主编丛书多套,主要有《城市化理论重构与城市远见丛书》、《中外城市发展比较研究丛书》、《城市科学前沿丛书》等。

在多年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与观点,如

首次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循环社会型城市发展模式理论”、“中国本土化城市形态理论”、“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理论”、“适度紧缩城市化发展理论”、“城市革命与土地资本革命理论”、“中国多梯度城市社会结构理论”、“中国区域城市化发展格局与模式理论”、“中国国际化都市圈的差序化格局理论”、“城市文化基因与城市文化动力因理论”、“区域城市群空间产业结构空洞整合理论”、“沿海与内地城市嵌入性结构关系理论”、“制度型投入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与模式理论”、“城市化的合法化危机的控制与整治理论”及“中国城市社会来临与中国农民的终结”的理论与概念等。

社会兼职：中国城市社会学会副会长、江苏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江苏省首批注册咨询专家、南京创意产业协会会长、江苏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南京城市研究院副院长、扬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院学术院长。创办并主编《中国城市评论》和《中国房地产评论》学术刊物。先后获得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主要有城市发展战略与城市社会学（国家 985 项目）、城市化理论重构与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1993 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我奉信的格言：“虽然真诚未必能够换取真诚，但是真诚只能用真诚来换取”！

再版前言

——用生命赞美城市

中国已经进入城市社会！^①

五千年中华文明一直是以农业立国，时至 21 世纪初的中国，城市人口仍然没有超过农业人口，而 1850 年英国就曾在人类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城市人口超过农业人口的现象，伴随城市化而来的是英国的工业化和社会的近代化历程，城市化和工业化成为英国曾一度称雄世界的基础。而当今的世界已经有接近 60%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成为人类现代化的整体表征，城市现代化无疑已经是人类现代化一种结晶和时间切面！

一、“活着”与“生活”

我们不仅要问，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城市？我们曾不知多少次问过，人类自己创造的城市，为什么异化为人类探究的对象？而伴随城市发展带来的相关问题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人类社会发生、发展已经有 300 多万年的历史，在这已知的历史长河中，为什么人类的都市只有 5 000~8 000 年的历史？为什么人类在 99% 以上的时间里，是在没有城市的空间里生存的，而人类一旦创造并走进了城市，人类社会就进入了加速度的状态？

这一切在我的研究视野中不止一次地被设问，我也一直力图通过研究获得科学的答案。然而，虽然经典作家已经明确提出城市是人类社会的中心和发展动力，城市也带给人类希望与财富，但是，城市从它产生那天起，就伴随着自身的问题走过了几千年。城市犹似人类主观与客观结合建构起来的千年古树，带着人类的理想和人类社会的病态一起走到今天！

马克思对城市产生和城乡第一次分裂的描述最为精彩：“第一次大分工，

^① 中国的城市人口在 2009 年已经达到 49%，2010 年城市人口将超过 50%。

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如果说,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艺,那么,土地就同样地占有农民,手艺同样地占有手工业者。”^①城市内的社会空间通过知识、技术和商品交换的整合,创造了城市特有的生活方式,使从乡村中走进城市的人类获得了新生,城市成为一种组织结构,成为人类与群体方式共生的一种自然表现。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新的组织总是最先产生在城市里,在古代西方,迈锡尼的城市创造了迈锡尼的集权文明与精彩;古希腊和罗马的城市不仅创造了人类文化的黄金时代,而且还创造了城市生活的一种方式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城市市民社会的思想。中国上古时代的城市创造了“天人合一”的夏商周文明,演义出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文化和地域学派,其不仅创造了学术繁盛,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儒家的文化思想,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草根文明”的基础,与古希腊罗马城市共创了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文化内核”。我们要明确地说,这种文化的创造、繁盛与创新都是附着在城市之上的。城市发展的历史证明了德国学者斯宾格勒的观点:“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第二代优秀人类,是擅长建造城市的动物。这就是世界史的实际标准,这个标准不同于人类史的标准;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国家、政府、政治、宗教,等等,无不是从人类生存的这一基本形式——城市——中发展起来并附着其上的。”^②城市已成为人类现代化进程的载体,然而,虽然人类试图把城市建造成理想的家园(“如家的城市”),但是因为人类本身社会发展水平以及财富分配的局限,历史上财富集聚从来就没有真正“平均”和“公平”过。尽管在已知的社会里,财富的平均和公平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人类理想与理性的取向中,社会哲人和人文主义者往往都会将城市社会的公平与平等作为社会的理想目标。

由于城市除了作为国家机器之外,又是人类任何社会结构的“盛载物”,不同时代的阶级关系、权力结构关系、社会结构关系、经济结构关系和家庭结构关系等,都在城市中获得了集中而又充分的展示,并形成与乡村不同的生活方式空间,而这个空间成为人类“城市性”的时间结晶和“集体记忆”。

在阶层与阶级分化的社会结构体系内,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或是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15

② 帕克,等. 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 宋俊岭,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3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城市一定是社会分化、阶级分化的典型场所与空间。在集权专制的社会结构内,城市一定是权力集中的表现地。在阶级矛盾对立的社会体系内,权力者和贵族是城市的主宰,而贫困群体一定是多数人,这种不公平是城市社会结构与功能的必然属性之一,时至今日,城市中的“被剥夺感”仍然是这种城市“质”性的延续。或许可以这样说,我们研究城市与其说是想改造城市,不如说是改造人类自身,因为存在着社会本身的空间不公平,所以才使得城市社会的物化空间必然存在非正义;是人类社会的财富分化、地位分化作为前提而分化了城市的物化空间,进而形成了与城市本身相关的社会问题,进一步说,是人类社会本身的问题——因为人类居住在城市里所以才必然显现城市的社会问题。同样,人类居住在乡村里就必然有乡村的社会问题。说到底,城市问题是城市人的问题,城市人的问题是人类社会本身发展的问题。我们熟悉的理论告诉我们,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必然产生相适应的社会结构,而城市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内,都必然是社会结构表现的一种方式。人类进化的本身是以发展生存方式、追求生活品质、创造欲望为本质的,从这一点上说,人类欲望的提升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性恶论”的一个永恒的实证,这也是人类本身的“质”性所在,是人类作为动物的一部分而必然的存在。城市的不完善性与人类社会本身的不完善性是一致的,人类及人类社会的不完善是永恒的,城市的社会问题也是永恒的,因此,追求完善是人类永恒的命题,我们研究城市、追求城市的完善也是永恒的命题,这是自然界与社会的存在方式,不存在没有问题的时代和社会,只是存在相对“善”和“恶”的社会,而我们追求的是创造以“善”为主的社会和城市。

为什么东西方的社会发展会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一个是以民主的市场经济为主,而另一个是以集权和统一的社会体系为主。其答案之一是:因为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城市,在东西方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一个是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向心力体系,对传统社会具有向心力功能;一个是集权专制结构中的离心力体系,通过市场和贵族民主转化为社会发展整合的离心力。中国传统的城市对于权力政体来讲,一直起着向心力的功能。中国从仰韶文化开始就出现了通过挖沟作为保护村落的设施,挖出来的土堆成的墙自然成为城墙的原型与基础,《易经》所说的“城复于隍”的认知便来于此,后来中国及国外很多的城市都有护城河,就是挖河取土建城形成的。作为中国城市的一种定制,一

般城墙外(下)一定有护城河,这种城市建设模式更多体现的是城市的军事功能和权力者的保护功能,城市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墨子》曾有专论说“城”、粮食与兵器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在这样的前提下,“城”作为国家机器,在大一统的集权国家政治体制下,城市始终是国家的区域管理治所。城市也是统治农村和剥削农村的社会发展中心,在中国的历史上通过郡县体制创造的各级城市,既是国家政治和区域政治中心,又是国家与区域统治的管理治所,同时又是国家及区域的军事中心。

比较西方的社会发展而言,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以单一城市中心为主体的社会发展历程,国家整体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城市的周期性兴衰表现为国家的周期性兴衰,或者说国家的周期性兴衰表现为城市的周期性兴衰,城市与国家命运相通,城市成为一种政权与国家的象征。中国的城市在维护中国封建制度的长治久安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比西方长很多,虽然原因较多,但其中传统的封建城市在政治上的强大功能和生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是到了近代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攻克了中国的城墙,中国城市引进了西方的城市理念与管理模式,才开始出现以经济和商业为主要功能的城市;或者说是直到近代,中国的城市整体功能才开始突变,并成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力。近代上海、天津和香港等城市的蜕变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比之中国来看,西方在古希腊罗马以前,迈锡尼城市文明衰落后,代之而起的是古希腊城市文明。这一文明利用了古希腊原始的民主关系与迈锡尼的集权制度、先进的生产力与文化结合,创造了古希腊的奴隶主贵族与平民的民主,在城邦制体系下,建构了希腊文化神话,也因此被喻为人类文化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城市内奴隶主贵族间的民主政治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某种城市性的民主文化空间,如城市市长选举、城市平民阶层和工商业者的合法性政治地位等,城市商业和商品交换的繁荣也推动了城市社会的进化,并导致了商业文明所形成的某种政治民主。然而,在历史的演化中,希腊城市文明传统商业的过度发展和奴隶体制本身的矛盾深化导致了社会价值的解组,从本质上看是奴隶制极端政治的弊端导致了这一文明的衰落,古罗马的城市文明因此代之而起。

古罗马的城市文明变迁承继了古希腊文明的一般特征,这一次社会结构变迁也似曾相识地出现了原始部落文化与古希腊文明的生产技术、政治体制

相结合产生的新的社会结构——最初的罗马也曾上演了奴隶贵族的民主与平等文化,城市市政厅、城市议会、全新的市场经济关系等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但是,权力者的过度奢侈、宗教的过度控制、国家集权化的过度极化、贵族的堕落、阶级对立的深化及奴隶贵族对劳动的鄙视及过度的权力滥用,首先出现城市的衰落,并导致了国家的灭亡,而从此进入中世纪后的西方曾有长时间的沉默,并形成了所谓的“中世纪初期的黑暗”。即使有这样的过程,我们也已经看到,古典时代的奴隶庄园经济就已经表现出某种意义与价值——创造了独立于城市以外的经济与社会体系。

当西方中世纪城市再度兴起,城市文艺复兴成为这个时代的旗帜的时候,我们看到,中世纪城市在交通要道、在军事要塞、在教堂附近、在封建采邑内、在河流渡口边等,商业贸易带来的城市兴起,在城市里主要居住的是僧侣、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管理者。而乡村的庄园里居住的则是贵族和权力者。让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城市商业的发展使城市作为经济体,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城市联盟与城市商业同盟为城市商业设定了“保护伞”;城市中的行会为城市法人的发生创造了土壤。另外,正如马克思所说,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不是“从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逃亡的农奴建造的。^①城市里有商业贸易、手工业作坊等,庄园里同样也有商业贸易、纺织作坊、食品作坊等,而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整体发展表现出了“两个核心力”,或者说是“两个动力源”,指的就是城市和庄园,即城市手工业商业贸易的经济核心与乡村庄园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两个“经济核心体”,形成了所谓的“双动力机制”,亦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讲:“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初期的城市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②而这一层面的核心价值是“城市法人”的经济关系与文化,以及从原始贵族民主演化而来的市场经济关系下的民主政治。虽然这样一种制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着人类的弱性和发展缺陷,但是,毕竟是经过历史证明和比较印证的一个历史过程。

不言而喻,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与人类的整体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要问的是人类如何来理解城市?城市是什么?在汗牛充栋的著作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7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67

中,人们对城市褒贬不一,对城市发展模式的争论也是莫衷一是,甚至对城市没有任何研究的人,也会对城市给予评价和批判,因为人类居于城市,在城市中的人对城市都有自己的感悟。当我们剥开个人的城市意象,在寻找人类的整体记忆之时候,我们有责任对城市的价值和功能给予再一次的说明,面对“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发展意象,我们有必要对城市本质进行再认识,即城市究竟为何物?

首先,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心和动力,这也是经典作家的观点,也是已经形成共同认知的常识。城市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已经充分表现了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功能与价值。

其次,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是社会学经典作家的观点。作为一个城市研究者,我十分认同这样的价值与事实判断,城市生活方式的核心是人的终极价值的创造,而这种方式是与乡村比较而言的生活方式,是以城市人的“事本性”为其主要价值取向的生活模式,正因为城市社会能够让人们或者强迫人们去追求理想,所以城市才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和“文化动力因”。

其三,城市是地域生产力的一种结构形式。城市就是生产力,与其他生产力要素不同的是,城市是地域生产力的集中表现方式,城市存在的意义表现为一定区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能力。一个显性化的事实是,城市发达的地区都是生产力较发达的地区。

其四,城市是社会财富与资本的中心。无论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著作中,还是在相关的专业论述中,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城市本身表现了人类财富的价值,城市是人类财富的集中表现。无论是高大雄伟、鳞次栉比的建筑,还是城市里的博物馆、银行;无论是艺术宫、教堂、大学、研究机构,还是工厂与住区;抑或是集于城市中的人才,都显示出城市是人类财富与资本的象征意义。

其五,城市是人类文化的容器。人类通过积累性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甄别机制,使城市在主体上表现了人类的文化精华;虽然人类黑暗的一面也在城市里呈现,但是城市本身的主体价值还是向上和进化的。

其六,城市是改造人类的一种“文化场域”。人类创造了城市,通过人类社会中多数人群体的理性价值取向的整合、控制与制度建构,城市创造性地建构了群体理性的生存方式,城市内部也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和结构。这种结构自身生成了一种互动性结构功能,通过规范、约束,甚至迫使生存在其

中的人必须遵循这种结构,人类在适应这种结构中成长和发展,在发展中建设城市,与此同时,城市在发展中反过来作用于人类,在一定程度上改造和型塑人类。城市的理性的价值主体是推动城市进化的,即在寻求以多数人利益为前提的社会目的性建设中规范每一个人,并进行社会进化的理性引导。正因为这样,不同的城市才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特质、模式、属性和城市文化人格,也因此而出现“巴黎人”“纽约人”“北京人”“上海人”“东京人”和“香港人”的认知价值取向。

其七,城市是具有公共财富属性的“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综合体。“城市文化资本”作为城市特有的一种要素,可以形成城市特有的发展动力要素,而一旦城市资源转化为“城市文化资本”,这种属于城市本身的文化资本就会形成资本的垄断性、历史的延续性、价格的刚性和文化的品位性,而使城市具有魅力。如北京的故宫、长城、中南海;杭州的灵隐寺、六合塔、龙井;南京的中山陵、夫子庙、秦淮河;沈阳的东陵、故宫、北陵等。这些要素的价值也往往会成为城市人骄傲的资本和身份地位的价值体现。此外,城市是人类创造的与乡村不同的生存共同体,城市本身具有地域空间和社会空间两个范畴,在这样的范畴内,这两个社会地域空间范畴创造了共时性的“城市市民社会空间结构”,使城市本身具有人类文化创新的结晶性。“城市文化资本”在通过人的理性创造,在其再生产的演义中,形成文化的涵容机制,这个涵容机制使城市体内存在着的文化,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现代性,在这个现代性的城市体系内存在着的人力资源,可以通过“城市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有效地转化为人力资本的价值,这正是“城市文化资本”的特殊意义与核心价值所在。正因为“城市文化资本”存在着特有的功能,在寻求创造千年品牌城市价值的同时,我们极力提倡、建构、创新“城市文化资本”体系。“城市文化资本”一旦建构成立,城市社会内部就会形成一种内驱力,城市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便会出现循环累积性增长,并转化为内在结构与功能,通过城市文化的涵容、创造、扬弃与创新性建构,形成一种以人文精神为象征的城市“文化动力因”,可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个可以观察的社会事实是,世界一流的城市都是“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能力十分充分的城市。

其八,城市是自然机体的一部分,城市必然重归自然。人类来自于自然,人类创造的城市应该是自然的一部分。虽然这种观点在人类工业化以来曾被遗忘,但是今天重拾这种理念和价值,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一个国

家和民族的城市真正能够以感恩自然的方式,重归自然的时候,这样的国家和民族一定会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

其九,城市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人与人的全面的依赖关系,是通过“无形的手”的价值,形成了城市社会关系体系。这种体系与关系成为城市社会的本质,即通过迂回的、以价值符号为互动表现的货币交换关系,形成一个陌生人世界的生活共同体,在这个社会关系体系内既能够创造天堂般的美丽故事,又能滋生出地狱般的生活困境。城市适应所有的人,因为城市是一种社会关系体,只要你能够在这个社会关系内,寻找到自己的坐标,就能够寻找到个性化的生活道路。

为什么城市会有这样的价值和功能?为什么新思想和文化往往产生在城市里?我们可以假设把人类社会中的人简单归结两种:一种是“生活着的人”,一种是“活着的人”。“生活着的人”就是在价值理想的存续中,去追求理想和价值,特别是追求为多数人谋幸福的价值,这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核心价值,即城市是有价值取向的生活场域。“活着的人”,或许是社会的造物,也许是马斯洛所说,当人们不能满足最低需要的时候,某些人追求的价值甚至是生命的自我取向都无从谈起。在我所著的《民族偏见与文化偏见——中西文化比较新论》的前言中我曾说过:“特别是当我清楚地看到现代文明和现代文化正在重新造就成千成万个‘神灵’的朝拜者时;当我在杭州灵隐寺和寒舍附近的鸡鸣寺看到数不清的‘进香人’整齐地排着队,从千里以外赶来朝拜时那虔诚的面孔时,心中就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悲哀!”^①或许应该这样说,无论生活在哪一个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只是追求的层次不同,或者是追求的理解层次不同。即使是“活着的人”,也有一种追求,只是这种价值取向离我们的认知太远而已。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个人的追求与文化选择,相反应该去尊重每一个人的文化选择。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有义务和责任引导社会的人们去选择优秀和“善”的文化,引导社会以向上的力量和方式去让更多的人不仅仅是“活着”,而且要有所追求并创造性地生活。

我们应该思考人类整体的终极价值,以一个学者和城市社会学研究者的身份去关心城市人的生活和未来城市的生活,或许这应该是一个典型知识分子的责任。

^① 张鸿雁:《民族偏见与文化偏见——中西文化比较新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二、“纯理想”与“纯反思”

相比较而言,城市与乡村就是通过集中、分散表现了这两个空间的功能与价值。我曾下乡随父母走“五七道路”,在深山的乡村中学读书,毕业后又到深山的“青年点”当“知青”。在深山的小村庄里生活时,是1970年代初,当时村里还没有电灯,几乎过着原生态的传统乡村生活。1972年,我就读于辽宁省西丰县凉泉公社凉泉中学的高中部,时任班长。那年夏天,班里几乎有一半的人不来读书了,我便一个人一连十几天从这一个村庄走向另一个村庄去找同学说服他们上学。各个村庄相隔几十里路,饥饿、疲劳、被拒绝和无助是我当时的直接感受,当我一个人回到自己住的城子山脚下的德贤村时,夜晚降临,近处是山林呼号,远处有野狼呼嚎,望着星空,那种对理想和生活的绝望、那种对前途和生存的迷茫、那种内心的空虚与生活的空灵,时至今日还历历在目,惴惴于心……是的,乡村的生活可以描写为静谧而恬淡,但是,那是某些理想和欲望获得一定实现与满足的一时的空灵与独乐,在某种意义上是苦痛的前奏。时至今日我仍无法想象那种没有理想、看不到理想和实现不了理想的生活。当人缺少了理想,当人无法追求理想,甚至不知道理想为何物并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绝望。正如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外乎是因为城市能够给人以理想,城市能够让人看到理想,并给人以理想的阶梯、内容和表现。许多年后,看过一个电影叫《一个都不能少》,我曾几度为之潸然泪下……

我曾为我的记忆所感动,我曾为我学生时代的激情所感动,也曾为深山贫苦村民的淳朴而感动,但是更多的是为曾经拥有的记忆中的原始农村生活而伤感。之所以写出这样的一个亲身经历,是因为这是我生活在原始乡村之后对城市的理解,旨在告诉所有的人,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文化资本”的创造,其最简单的目的是创造人的价值、生活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创造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质量;创造多数人的价值,让多数人能够有理想并能够为实现理想而“生活着”!

乡村的生活,特别是那些刚能够,甚至不能够保证最低生活水平的乡村生活,其人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如何去探求?如果还有人生活在生活底层的原始农村,这是我们当代人的失职!

研究、建构“城市文化资本”就是设想能够创造城市的永续动力,最终让更多的人成为城市人——城市生命价值的创造者,成为能够在为自己创造价值的同时,也能够为他人谋福利的“社会经济人”。这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理想类型,或许这也应该是人类城市的理想。城市就是人类追求理想的表征,我们试图在依靠这棵理想之树的同时,也对这棵老树加以修整、整饬和保护,甚至给予新的生命与力量。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城市?是因为城市作为人类社会二律背反的一种表现体,既要让城市的正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又要能够让城市克服旧我,以正功能的价值为主体存在于世间,并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进化。进一步说,我们研究城市的本质和最终目的,是让城市合理、和谐、科学地进化,是让人类在建造、创造城市空间与价值的时候,减少并克服其负功能,展现其正功能。

对于城市的研究,我一直处于反思之中,我们究竟做了什么?在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中对“反思”的认知使我颇受启发:“反思可能是纯的或不纯的。纯反思——反思的自为面对被反思的自为的在场——同时是反思的原始形式和理想形式;这种形式建立在不纯反思由之出现的基础之上的,它同样不是首先被给定的,它是通过一种涤清(Katharsis)获得的。”^①这个“涤清”的概念用得非常好,是的,反思就是对以往研究的一种清理和洗涤,在除却旧观念中实现创新。在城市研究中,我最初是在研究城市发生的意义,并在研究城市的发展中寻找城市规律,但是,为什么人类在能够看到城市问题的时候,而不能有效解决?是不是看到了问题就应该能够解决问题?显然,当我们能够看清很多问题的時候,甚至我们能够拿出有效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而问题不仅仍然存在还会有新的问题发生!是谁不能解决问题?是谁不想解决问题?是谁不去解决问题?其回答是简单的!是人类本身的惰性和人类本身的动物本能,这也是现实社会问题的终极根源。因此,需要反思,需要反思人、所有人,包括乡村人和城市人的价值。

我们在研究社会整体人群的终极价值,特别是群体价值与群体理性所构建的一种社会关系时,自我能够感受到在世界范围内如何形成群体的生存力量,无论城市社会存在何种问题,人类总是以正功能的价值来推动城市社会发展的。但在深入研究中,我们发现,也许是一种回归,在研究城市本身的价值的时候,又在研究和思考自己的研究,以及自己个体的生命价值。对于以往的

①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宜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217,219

研究,我一直在反思!我们研究了什么?我们建构了什么?在这里还用萨特的语言来表述,“同样的看法可应用于任意一个反思的事实,我读,我做梦,我感知,我行动。或者,这些看法导致我们对反思的明确无疑的明晰性:那么我对我的原始认知在或然中崩溃,我的存在本身只是一种或然性,因为我的在瞬间中的存在不是一个存在;或者,应该把反思的种种权力向人的整体扩展,就是说,向过去、将来、在场、对象扩展。然而,如果我们的看法正确,反思,就是要把自己作为不断未完成的整体来把握的自为。”^①我的研究是不完整的,仅仅是一个中间过程,仅仅是给后来者创造一个阶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创造自己的研究模式,在认识城市本身的价值的时候,能够让更多的人从不同层面来理解和认识城市,在城市的研究中认识生命的价值。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我的父亲已经得了癌症,并由我来照顾的时候,当我看到老父亲知道自己生命的终点而艰难地活着的时候,引起了我对人、人生、生存、生命意义的再思考,同时也给了我人与城市、城市与群体价值,以及城市与生命等方面的新的认知。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城市是人类生命的延续,创造人类延续生命的文化价值与结晶,是城市的价值所在。

作为人类生命的精彩舞台,作为超越个体生命时空的人类进化模式,城市应该是人类“善”文化的发祥地,应该是人类生命延续的赞歌。我提出“用生命赞美城市”的理念,事实上也可以说成“用生命创造城市”。在人类历史上,城市曾作为市民社会的舞台,而成为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城市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变革的力量。

我能构建什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探索,可谓上下以求索,试图在这样的时代,能够找到自我和城市的生活方式的价值,创造一个比自己的生命更长久的符号,创造生命价值在城市中的延续!

在对中国的城市研究中,中国城市发展的历程和规律是我们探索的重要内容,从中国城市发生的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我们看到的是古代中国城市的空间与价值表现一直是以皇权为中心。其对称式的棋盘形城市格局,成为中国元素的主要代表之一,而中国式的这一城市空间结构——“天人合一”的思想,已成为世界城市百花园中一棵奇葩。西方现代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正在实践着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

任何事物总是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价值,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集权式的皇权

①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217,219

结构和阶级结构关系,创造了封闭型的城市空间结构,从中国的万里长城,到城市的外城郭,从城市的主城城墙,到内城的城郭,再到街区的里坊墙,及四合院落的围墙,一层层封闭的城市空间,使得中国城市开放程度成为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尺度。但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业立国的经济发展,城市总是在汪洋大海般农业经济的空间生存着,直至1848年前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只有10%左右,当时的美国的城市化也只有10%左右,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一百年后的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是在10%左右,出现了世界罕见的一百年的城市化停滞。这100年西方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后,有些国家地区已经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的发展状态,美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接近70%。这100年来应该说是中国城市的发展遭到毁灭性打击的100年,灾害不已,战火连年,狼烟四起,断壁残垣是近100年的时代标志之一。1949年后,中国的城市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变迁,但是从1949—1978年的30年间,城市化水平仍以非常缓慢的方式发展着,到1978年时也只有17.8%,当时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状态。1978年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出现了空前的发展,并成为世界城市化增长最快的地区。2009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接近50%,国家公布的城市人口数达到6亿多。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其城市化率还相对较低,但其城市人口绝对数值在世界范围已经占居首位。这正说明了中国的城市化走向:一个全新的市民社会正向中国走来!

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前提下,城市政府仍然保留了传统城市的功能,即城市作为国家政治管理治点和节点的功能仍然居第一位。城市是国家机构政体的结构构成体系的一部分,在城市化的发展中“制度型投入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源,即城市的发展规模是由政府制定的,城市投资的主体是政府;城市规划是政府主导、管理制定的,城市建设的主体也是政府管理和控制的。这样的城市化使得中国的城市建设与城市政府的政绩效应联结在一起,使得有些城市的急功近利开发建设不可避免,造成了与城市化相关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加上,中国的城市化来势凶猛,中国的一些城市管理者、规划者、设计者和相关的专家缺乏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经验,即使到1990年代,也没有哪个城市经历过40年以上的城市规划验证期,多数是照搬照套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方法,缺乏长远的城市建设规划,一些城市甚至出现了典型的“建设性破坏”,如城市记忆的丧失、城市生态的失去、工业化的过度发展,环境